

中国人口与发展地理波分析^{*}

尹文耀

【提要】 发展的地理波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中国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几大地理波波及区。它反映了发展的时空梯次。本文以中国地区发展的时空梯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提出人口与发展的地理波问题,分析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及其下级系统各种地理波现象及其规律性,并尝试将其用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上。

【作者】 尹文耀 浙江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各地区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资源、环境不仅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而且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次序。对于这种空间差异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对于时间次序及其规律,则研究不多。将空间差异与时间次序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地区发展的时空梯次及其规律,将为中国制定宏观的长期的区域发展战略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一、人口与发展的地理波与类地理波现象

(一) 地理波与类地理波现象

我们对中国各省级行政区(以下简称省区)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及其子系统发展的时空变化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发现不少人口现象和系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理上呈现出一波又一波的反复、循环波动过程和由近及远波浪式发展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某一区域最先达到或超过某种水平,随后在周围地区和更远的地区依次达到或超过这种水平;此后该区域的发展又达到了新的高度,周围地区和更远的地区又开始依次向新的高度发展。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例,上海率先在1983年降至10%以下,随后其相邻地区浙江在1988年、江苏在1992年分别降至10%以下;与浙江和江苏相邻的安徽在1993年降至10%以下;安徽邻省湖北、浙江邻省福建在1995年,江西在1998年降至10%以下;此后福建、江西的邻省广东在1999年降至10%以下。这样就形成了“上海(1983)^①→江苏(1992)→安徽(1993)→湖北(1995)”和“上海(1983)→浙江(1988)→福建(1995)、江西(1998)→广东(1999)”两条10%人口自然增长率由近及远波及路线。当上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更低的水平时,其外围地区,也沿着这两条波及路线先后降至同样低的水平。

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如10%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波及路线,在华北和黄河流域有天津(1989)、北京(1990)→河北(1991)、山东(1991)→河南(1993)→陕西(1995)→甘肃(1999)。在东北有辽宁(1989)→吉林、内蒙古(1991)→黑龙江(1993)。另外还有四川(1991)→湖南(1992)→广西(1997)→广东(1999)。

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外,其他人口指标都有类似的现象,只是波及路线不一,时间不等。在更广泛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省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研究成果之一。

^① 括号内的数字为降至10%以下的年份,下同。

范围观察,不仅人口,而且经济、社会其他领域,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地区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差、空间差。其中有的在地区间有直接的内在联系;有的有些联系,但主要是间接联系;有的则没有必然联系。为了形象简练地描述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为发展地理波或类地理波。

(二) 考察地理波的方法步骤

本研究是要综合考察中国省区人口与发展的各领域的时空变动规律,所关注的不是单项指标,而是综合性指标。

1. 设计综合考察人口与发展的指标体系。本文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将人类社会视作一个人口与发展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由人口自身发展系统、人口经济系统、人口知识和信息系统、人口资源系统、人口环境系统、人口社会系统等6个下级系统构成。其中,后5个系统,主要是由人均量化指标构成,反映了人口数量与其他系统发展的数量对比关系。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其他出版物,少数数据来自其他权威性的出版物,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等。由于资料限制,人口与发展大系统、人口知识和信息系统考察的时间为1993~1999年,其他系统考察的时间为1990~1999年。

2. 对各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最大值无量纲化方法。其公式是:正指标为 $W_i = X_i / X_{\max} * 100$; 逆指标为 $W_i = 1 / (X_i + |X_{\min}| + 1) * 100$; 有适度值或最优值的指标: $W_i = 100 / e^{(|X_s - X_i| / X_i)}$; 式中, W_i 是无量纲化后的得分值, X_{\max} 是评价期被评地区 X_i 中的最大值, X_{\min} 是评价期被评地区 X_i 中的最小值。 X_s 为适度值或最优值。

3. 合成系统综合得分。用乘法对各指标得分值逐级合成人口自身发展系统、人口经济系统、人口知识和信息系统、人口资源系统、人口环境系统、人口环境系统综合得分,最后合成人口与发展大系统综合得分。乘法合成就是以各指标值的几何平均数作为系统综合得分值。

4. 将各地达到或超过地理波观察值的时间和分值标在地图上。要观察某种地理波现象,需要对描述该现象的指标确定一个固定的观察值,找出该指标在不同区域达到或超过该观察值的时间,并将其标在地图上。这一指标,可以是某一单项指标,也可以是多种指标合成的复合指标。必须具体指明是哪种事物哪项指标的地理波,也必须指明是按该指标的多高水平的地理波,即该指标的标准观察值是多少,如10%自然增长率地理波等。确定固定观察值的基本原则,是要使尽可能多的省区,在评价期能先后达到或超过这一观察值。观察值过高,只有个别省区能够在评价期达到或超过,就观察不出地理波在较大的地理空间传播的情况。观察值过低,多数省区评价期初很快、甚至同时达到或超过了该观察值,就观察不出地理波传播的时间差异。本文的每项观察值,都是根据这一原则,经过反复试算,直到能够在尽可能大的地域范围内观察到地理波的时空传动后才确定的。

5. 确定波动方向和路线。确定波动方向的依据是相邻二省区达到或超过观察值的时间,时间早者为先发展地,时间晚者为后发展地;在同一年度达到或超过观察值者,指标值高者,为先发展地,低者为后发展地。地理波的波及方向是由先发展地指向后发展地,并据此标出。

6. 确定最先发展地、中止地、波及路线。某一大的区域中比周围地区都要早达到或超过观察值的地区,我们称之为该发展现象的“最先发展地”。最后达到或超过观察值的地区,称为中止地。在最先发展地,经过波及地,到达中止地,在形式上有多种波及路线时,以最近、最直接的路线作为地理波的波及路线,即“近者优先”。

7. 根据最先发展地,划定波及区。所有达到或超过观察值的地区,我们称之为该种地理波的波及区。其余未达到观察值的地区,统称为“未波及区”。以最先发展地相区别,以中止地为界线,并以最先发展地命名,可将所有波及区分成大小不同的具体波及区,如京津波及区、上海波及区等。下面以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地理波上海波及区为例,说明波及区的划分方法。

我们以综合评价值13分为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地理波的观察值。上海的观察值为24.23,浙江

为 15.63, 虽然二者在考察起始年观察值均超过 13, 但上海高于浙江, 可确认上海早于浙江达到或超过 13, 故与浙江相比, 上海为先发展地。江苏在 1995 年超过观察值, 达到 14.12, 比上海晚, 与江苏比, 上海为先发展地。

以上海为最先发展地, 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地理波有几条波及路线。第一条为上海(1993, 24.23)^①→江苏(1995, 14.12)→山东(1996, 13.80)→河北(1997, 13.27)。河北的近邻北京(1993, 27.16)、天津(1993, 18.68)、辽宁(1993, 15.24)超过观察值的时间较河北早; 内蒙古(1997, 13.75)与河北同年超过, 但高于河北; 至 1999 年山西(1999, 12.20)、河南(1999, 12.50)均未达到观察值, 故河北即为该条波及路线的中止地。用同样的原则, 可确定第二条波及路线为上海(1993, 24.23)→浙江(1993, 15.63)、江苏(1995, 14.12)→安徽(1999, 13.30), 第三条波及路线为上海(1993, 24.23)→浙江(1993, 15.63)→江西(1996, 13.08)→安徽(1999, 13.30), 第四条波及路线为上海(1993, 24.23)→浙江(1993, 15.63)→福建(1995, 19.79), 中止地为安徽、江西、福建。

这样就形成了以上海为先发展地, 含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北在内, 以河北、安徽、江西、福建为中止地, 联成一片的人口与发展大系统 13 分地理波波及区域, 可命名为上海波及区。中止地是相邻波及区间的中间地带, 既可划入上海波及区, 也可划入与上海波及区相邻的其他波及区。考虑到河北受北京、天津影响更大, 河北放入京津波及区。

二、中国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地理波

为了在宏观总体上揭示中国人口与发展地理波的规律性, 这里主要具体介绍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地理波的最先发展地和波及区。各波及区以最先发生(发展)地命名。人口与发展大系统总体地理波观察值为 13 分。从总体上看, 中国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可以划分为七大波及区。

(一) 京津波及区

北京为先发展地, 含北京、天津、河北二市一省: 北京(1993, 27.16)、天津(1993, 18.68)→河北(1997, 13.27), 中止地为河北。

(二) 辽宁波及区

辽宁为先发展地, 波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 5 省区, 中止地为河北。即辽宁(1993, 15.24)→吉林(1993, 13.26)→黑龙江(1994, 13.85); 辽宁(1993, 15.24)→内蒙古(1997, 13.75)→河北(1997, 13.27); 辽宁(1993, 15.24)→河北(1997, 13.27)。

(三) 上海波及区

以上海为先发展地, 波及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山东, 最远可波及河北。即上海(1993, 24.23)→江苏(1995, 14.12)→山东(1996, 13.80)→河北(1997, 13.27); 上海(1993, 24.23)→浙江(1993, 15.63)、江苏(1995, 14.12)→安徽(1999, 13.30); 上海(1993, 24.23)→浙江(1993, 15.63)→江西(1996, 13.08)→安徽(1999, 13.30); 上海(1993, 24.23)→浙江(1993, 15.63)→福建(1995, 19.79)。中止地为河北、安徽、江西、福建。

(四) 湖北波及区

湖北为先发展地, 波及湖北、安徽、江西、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等 7 省区即湖北(1994, 13.05)→安徽(1999, 13.30); 湖北(1994, 13.05)→江西(1996, 13.08); 湖北(1994, 13.05)→四川(1996, 13.24); 湖北(1994, 13.05)→湖南(1995, 13.96)→广西(1995, 13.07)→云南(1996, 13.26)。中止地为安徽、江西、云南。

① 括号内的数据, 逗号前为达到或超过观察值的年代, 逗号后为该地区该项指标值。下同。

(五) 广东波及区

以广东为先发展地,波及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福建9省区即广东(1993,17.86)→福建(1995,19.79);广东(1993,17.86)→江西(1996,13.08)→安徽(1999,13.30);广东(1993,17.86)→湖南(1995,13.96);广东(1993,17.86)→广西(1995,13.07)→云南(1996,13.26)→四川(1996,13.24);海南(1993,19.16)→广东(1993,17.86)。中止地为安徽、四川。

(六) 西藏波及区

这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西藏在人口、经济(如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许多方面发展水平是最低的,但在资源、环境方面,尤其是水资源和环境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省区对口支援下,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发展事业、城乡人民生活较一些内地省区还要好;旅游外汇收入,也有一定优势,人口与发展大系统综合得分就高于周围一些省区,形成一个以资源和环境为主要得分、在外援下发展水平提高较快的一个先发展地,波及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5省区即西藏(1994,14.60)→四川(1996,13.24);西藏(1994,14.60)→新疆(1996,17.04);西藏(1994,14.60)→云南(1996,13.26);西藏(1994,14.60)→青海(1995,13.06)。

(七) 陕西波及区

以陕西为先发展地,波及陕西、内蒙古、宁夏、四川、广西、云南、湖北、湖南。这是贯串南北的狭长的梯级带:陕西(1994,13.22)→宁夏(1998,13.94);陕西(1994,13.22)→四川(1996,13.24);陕西(1994,13.22)→内蒙古(1997,13.75);陕西(1994,13.22)→湖北(1994,13.05)→湖南(1995,13.96)→广西(1995,13.07)→云南(1996,13.26)。

人口与发展大系统中中止地省区是:四川、河北、安徽、宁夏、新疆。1999年仍没有达到观察值的是贵州(1999,10.88)、山西(1999,12.20)、河南(1999,12.50)、甘肃(1999,12.64)等4省区(重庆未列入)。

人口与发展大系统地理波,比人口自身发展系统、人口经济系统、人口知识和信息系统、人口社会系统等子系统地理波的先发展地更集中,波及区的界线更明确,更有一定的规律性。这可能是它本身更具综合性的缘故。因篇幅所限,其他系统地理波的先发展地和波及区在此不一一列出。

三、发展地理波机理初探

由于数据限制,以上只是以省区为单位,以综合评价得分值(非地区间的公里数)达到或超过观察值的时间为依据,描述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主要系统发展地理波的推进情况,以反映中国各地区发展的时空梯次,即发展在空间上的时间性和方向性。以下也只是根据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对其机理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先发展地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条件、历史背景不同,中国少数具有某种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治和政策体制优势、科学文化优势或其他优势的地区较其他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在收入水平、生活条件、投资环境、就业机会等方面明显超过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如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等。在先发展地和后发展地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两个正反馈环,一个是促使先发展地与后发展地两极分化的、以劳动力人口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从后发展地向外迁流的反馈环;另一个是推动先发展地的发展向后发展地传播扩散、以人力资本为主体的发展要素向后发展地回流并生根发展的反馈环。

(二) 极化反馈环

多种研究表明,省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是劳动力人口由后发展地区向先发展地区迁移流动的基本动因。为了降低伴随迁移发生的物质费用、因生活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费用、因信息不明

造成的风险,在省区间迁移流动时,人们往往选择距离较近、有一定亲友关系和信息来源的高收入省区为目的地(严善平,1998),在统计学上表现为省际人口净迁移率(量)与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差别成正相关,与距离成较强的负相关(李树茁,1994;王桂新,1993);如将迁移人口存量(B地中A地迁移人口存量,即迁入B地的A地出生的人口总量)作为一定亲友关系和信息来源的代理变量,省际间迁移的人口数量主要取决于业已形成的迁移人口存量(严善平,1998)。而这种迁移人口存量,除特殊的历史原因外,又以就近省区为多^①。在吸引邻近省区劳动力人口就近迁移流入的同时,先发展地的多种优势,也吸引着多种渠道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向先发展地集中流动,从而给后发展地的发展造成某种困难,产生一种使先发展地和后发展地两极分化的力量。在极化过程中,后发展地的外迁流动人口要经历4种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候鸟式外出——开路式效应。最初的迁移流出人口在流入地无任何亲友关系,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身闯进先发展地^②。其规模往往较小。这种迁流人口有的是个人和家庭的零散型迁流,有的是集团型迁流(如工程队和成群的民工)。外来劳动力人口进入先发展地,使先发展地劳动力市场扩大,满足了先发展地投资增长和居民生活服务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利于投资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同时流入人口收入增加。这一阶段,除了工作分配调动和婚姻迁移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流迁人口仍周期性地往返于先发展地和后发展地之间。

第二阶段,连带迁流——广泛强化先发展地的发展态势和对后发展地外迁流动的引力。收入增加的外流人口对家乡亲友的示范作用,使更多的人产生外出念头。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关系或部分服务,家乡亲友也随之向他们迁移流入的地区迁流,该地来自同一地区的迁流人口存量增加^③。省际迁流人口规模扩大,劳动力供给增多,迁移流入目的地由城市扩展至乡村,地区范围扩大(严善平,1998);从事的行业由非农产业扩展至农业,就业范围拓宽,消费和服务需求增加,消费市场扩大(李永周、吴国良,2000),从就业和消费两方面促进着迁入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人口非农化、城镇化进程。同时向先发展地城乡不同行业广泛迁移流动,使仅有务农经验外出的农民也能增加收入,加强了对后发展地劳动力人口流出的引力。

第三阶段,长期居住——先发展地发展极效应的强化和对后发展地外迁人口的多种示范引力的增强。迁移流入人口,因迁移原因、行业、职业、文化水平、收入水平层次不同,形成了多种不同居住形式。迁移流入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职业、收入相对稳定,居住时间较长的那部分人也在逐渐增多,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口。这部分人定居倾向增强,购置商品房人口增多,促进了房产市场发展。随迁流动的子女,逐渐长大,教育需求增长,促进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青年人长期受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求知欲望增强,促进着职业培训市场的发展。他们从多方面推动着迁移流入的先发展地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扩大,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作为发展极的作用增强。在先发展地的长期居住,不仅收入水平,而且居住条件、教育条件、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进步,更强化了对后发展地外迁流动人口的示范作用和吸引力。

第四阶段,社会融入——先发展地与后发展地间长期稳定的社会联系及多种信息通道的广泛建立和拓宽。在先发展地长期生活、劳动、学习、定居的外来人口,与当地建立了日益广泛的联系,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先发展地的一员,而不再是外来客居之人。但他与原迁出地,仍有着广泛的血缘关系、乡亲关系,成为先发展地和后发展地相互联系的媒介和信息通道,成为后发展地向先发展

① 如迁入北京、天津的以河北、山东出生的人最多,迁入上海的以江苏、浙江出生的人最多,迁入新疆、宁夏的,以甘肃出生的人最多(段成荣,2000)。

② 据对山东省桓台县两镇调查,民工外出前对外地了解较多的仅为1.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999)。

③ 据对山东省桓台县两镇调查,外出人员经亲友帮助介绍工作的占74.1%,帮助提供信息的占11.1%,提供资金帮助的为2.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999)。

地后续迁流的历史地起作用的社会纽带。在向就近省区迁移的同时,河北、山东人习惯于到辽宁、吉林、黑龙江“闯关东”,河南人则习惯于向宁夏、青海、新疆“走西口”,浙江人在天津迁入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段成荣,2000),可能都与这种“历史地起作用的社会纽带”有密切的关系。

以上是对一批人从外流到定居的全过程进行的考察。实际上存在多种不同批次的人,他们分别处于各种不同阶段,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经历各个阶段,因此这4个阶段、4种形态、4种反馈形式在生活中是同时并存的,只是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主要形式不同。

人口外迁流的4个阶段,实际上是推动人口迁流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的4种不同的反馈形式。每一次反馈,都将强化先发展地对后发展地劳动力人口和资金的吸引(如后发展地青壮年劳动力和能人外流、有一定投资能力的人携资外流、大中专学生外流等),加强先发展地的优势地位,加大后发展地的困难,从而加大极分化的力度。

(三) 波及反馈环

波及反馈环也可以分为4个发展阶段,或4个不同层次的循环反馈。每一个阶段的循环,都使后发展地的发展水平提高一个层次。

第一阶段,劳动收入回流——资金向后发展地流动。与后发展地区的外流劳动力人口形成相向对流的是以劳动和经营收入汇回家乡为形式的资金。这些回流至后发展地区的资金,提高了当地居民的购买力,扩大了群众的有效消费需求和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促进了当地消费市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阶段,劳动力人口回流创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先进文化向后发展地流动。流出地消费市场的发展,为批发业、零售业、生活服务业、住房建筑业及部分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新商机。在先发展地先进文化、先进生活方式熏染下,或经过培训、或经过工作实践、或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提高了多种素质,人力资本得到多方面增殖的外出劳动力,被家乡新的商机和发展所吸引,开始回乡创业。那些回乡创业的成功者,像外出打工成功者引起连带迁移流动一样,引起连锁回乡创业的效应。回流人员的创业,二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也使当地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增强,从而为政府兴办各种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回乡创业的地点有向小城镇汇合的趋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999),促进了当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阶段,外部人才等要素引进——人才、资金和技术引进后发展地,部分产品回流先发展地。人才劳动力的回流,提高了当地人力资本存量;改善了当地投资的社会环境,建立了与先发展地新的社会联系,增加了当地社会资本^①,从而使后发展地吸引外部物质资本、技术和人才劳动力的力量和绩效提高,逐步形成了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部分产品开始返销先发展地,甚至国外。

第四阶段,外来人才劳动力主动流入——劳动力人口素质结构和全社会产业结构升级,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经济体系。这一现象在第三阶段已经存在。所不同的是,在第三阶段为后发展地政府和企业,积极主动地引进为主,在第四阶段,则是外部人才劳动力积极主动地流入为主,其重要标志就是新毕业的大中专学生,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将这些地区作为可供选择的工作目的地;大型企业集团主动将这些地区作为投资的目的地;成为周围其他地区人口外流的重要目的地和迁移流入地,外来劳动力人口比重大幅度升高。

在第一阶段还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后发展地,到第四阶段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成为某一水平地理波的波及地区。该地区与其邻近、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之间又开始了上述两个反馈循环,通过类似的过程将发展地理波传播到尚未波及的地区。这样一波又一波地将发展地理波推向更远的地区。

(四) 两个反馈环的相互作用与地区发展的趋同化

^① 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它在具有经济理性的交换与回报的人际关系中具有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的增殖作用(科尔曼,1990)。

两个反馈环相辅相成,同时并存于先发展地与后发展地之间,且4个阶段相互对应。第一个反馈环是促进先发展地发展,第二个反馈环是促进后发展地发展。第一反馈环是先发展地不断产生新的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反馈环是将先发展地的新发展向邻近地区传播扩散的重要形式。后发展地与先发展地的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以及发展地理波传播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反馈环各个阶段相互作用的强度。第一个反馈环的强度大于第二个反馈环,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发展地理波的传播速度减缓;两个反馈环强度均衡,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基本格局相对稳定,发展地理波保持稳定的传播速度;第二个反馈环的强度大于第一个反馈环,地区差距缩小,发展地理波传播速度加快,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缩小,呈趋同化趋势。两个反馈环作用强度,因不同地区、不同阶段而不同,所采取的主要策略也应不同。

(五) 地理波的传播方式

发展地理波的传播,有连续平面式传播和“飞地立体式”传播两种形式。所谓连续平面式传播是指发展向相邻地区传播,相邻地区发展后,再向更远的相邻地区传播。这是地理波的一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劳动力人口就近迁移流动,先发展地企业就近投资,先发展地产业的就近转移扩散,所形成的就是这种传播方式。在我们以省区为单位进行研究时,这种情况就类似于空间扩散理论的传染扩散。所谓“飞地立体式”传播发展,就是先发展地的发展不经过相邻地区,而是通过某种媒介,越过相邻地区,直接传播至不相邻的地区。在劳动力人口就近迁移流动的同时,还有相当部分利用历史形成的习惯性路线,或新探索的路线跨越邻近省区迁移流动;中央政府对后发展边远地区的直接扶持投资,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各地区对后发展边远地区的跨区域对口支援;先发展地和后发展地城市间的等级扩散^①,即先发展地中心城市的新事物,越过城市级别较小的省区,向有同等级城市的省区扩散,这些都将形成“飞地立体式”传播。

四、发展地理波理论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应用

(一) 加强八大区域性先发展中心培育

要使各地区普遍发展,必须先使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然后通过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将发展的地理波推进到其他地区,带动其他地区一起发展。

根据现有的基础和区位条件及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在东部应继续加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广东的发展和建设;在中部可以将湖北作为先发展地加以重点培育;在西部加强对陕西培育的同时,有计划、有目的地重点加强新疆、四川的工作。如果在西部大开发中,陕西、四川(含重庆市)、新疆三省区能率先发展起来,对于西部来说就可以从东西两侧形成相向传播扩散的发展地理波,带动西部省区发展。这样就在全国三大地带形成层次不同、布局合理的八大最先发展地。

辽宁、北京、天津、上海等是人口经济系统地理波的最先发展地,却不是人口环境系统地理波的最先发展地;人口环境系统最先发展地却是经济不发达的西藏。如果辽宁、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既能够是人口经济地理波的最先发展地,也能够成为人口环境地理波的最先发展地,就能够为周围广大地区提供经济发展和环境状况率先改善的经验。这将不仅有利于这些地区本身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会促进周围地区人口、经济、环境走向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轨道,进而影响全国。

(二) 建立4个区域性全方位合作区,协调东、中部两个“U”字型地带的发展

在中国东、中部有两个“U”字型地带,“U”字型地带底部省区的发展,对全国发展具有重要影

^① 城市间的等级扩散,指新思想、新技术在城市中的传播往往跳越紧邻的小城市,在距离较远但属同级规模的城市中首先被接受,然后向次一级的城市扩散(许学强等,1997)。

响;应该建立4个区域性全方位合作区,协调两个“U”字型地带的发展。在东部,已经形成了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区相连、率先发展的弧形发达地区。根据现阶段发展势头,这一发达的弧形地带将逐步扩展至山东。在这个弧形地区与湖北之间,还有相对落后的第二个弧形地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其中有的省发展水平与西部相当。第一个弧形地区和中部发展水平相对高些的湖北,现阶段处于地理波的波峰位置“U”字型的两端,第二个弧形地区,处于地理波的波谷位置“U”字型的底部。这是第一个“U”字型地带。

这表明,在极化过程中,上海波及区北对江苏、山东,南对浙江、福建,以及广东波及区对东北方向的福建形成的极化作用已经减弱,而波及作用上升为主要趋势。但第二个弧形地区的外侧受到了第一个弧形地区极化作用的影响,内侧受到了湖北极化作用的影响,这种极化的负作用强于波及作用,使得第二个弧形地区省区的资金、人力和人才向两侧外流,导致了第二个弧形地带发展迟缓。河南、安徽1996~1999年的外来人口比重、1997~1999年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从业人员的比重都低于东西邻省区江苏、浙江、湖北。江西1997~1999年外来人口比重、1996~1998年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从业人员的比重都低于邻省福建、广东。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东西两侧极化作用产生的负作用的影响。第二个“U”型地带,是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及辽宁、山东。北京、天津处于“U”字型的一端,辽宁、山东处于“U”型的另一端,河北则处于“U”型的底部。

这两个“U”字型的波谷地带是发展地理波推进的阻隔区、阻隔带。它的存在,不仅影响到这些省区本身的发展,更影响到发展地理波穿越这些省区,向更远的省区传播,影响到上海、广东、北京、天津对全国发展的带动作用。能否尽快消除这些阻隔区、阻隔带,将会影响全国的整体发展进程和水平。

地区全方位开放是发展地理波向各地推进的必要条件。在相互开放中,受益的不只是先发展地区,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必须在相互开放中才能实现。根据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要促进两个“U”字型地带底部省区的发展,可以在东、中部先发展中心地区与发展阻隔地区之间建立4个区域性的全方位开放合作区。所谓全方位开放合作区,即尊重市场规律,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在省级政府合作协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人口开发利用全面规划指导下,积极推动合作区经济组织、科研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机构,开展平等互利,互补互动多种合作,有计划、分步骤地扩大先发展省区对后发展省区的波及作用,将发达地区极化过程中对周围地区产生的负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这4个区域性的全方位合作区是:(1)京津冀全方位合作区,含北京、天津与河北。(2)沪苏浙皖全方位合作区,含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3)粤桂闽赣全方位合作区,含广东、广西、福建和江西。(4)鄂湘全方位合作区,含湖北、湖南。

20世纪80年代,广东和福建特区的开放,推动了广东波及区的形成和扩展;90年代上海浦东的开放和江苏、浙江的改革,推动了上海波及区的形成、扩展及与广东波及区的汇合。21世纪第一个10年,应以兴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以北京、天津为龙头,使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在内的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建成新先发展圈,形成将新的一层发展地理波推进到吉林、内蒙、山西、河南的态势。

(三) 通过立体辐射、“飞地”合作的方式,将东、中部的发展地理波向西部推进

我们提出形成4个区域性全方位合作区,就是要利用连续平面式传播方式,加速地区发展。但如果只按连续平面式推进发展地理波,发展要传播到边远地区,必须等到从先发展地到边远的后发展地所有中间地带都发展后才行。这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当某项发展经过很长时间传播至边远地区时,在先发展中心地,很可能已经过时,就要淘汰或已经淘汰多年了,成为过时传播或不适时传播。这样远离先发展中心地的地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发展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在继续利用连续平面式传播时,必须积极创造条件采取“立体飞地式”传播发展的方式,推进边远地区的发展。中

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方式的具体应用。

能否成功地应用“立体飞地式”传播方式加快西部的发展,企业跨区域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具有重要作用,而中央政府的宏观组织领导和财政转移支付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将人才西进和劳务东输相结合,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之一

从地理波的推进机制看,中国西部大开发,需要两种方向的劳动力人口流动。一是人才西进,即跟随西部重点工程建设,中央、地方、企业和民间资金西进,各级人才、特别是中高级人才,以及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劳动力也随之西进。二是劳务东输。劳务东输,则是一项“一箭多雕”的战略举措。应努力使西部劳务输出规模化、规范化、有序化,为劳务输出提供产业化、专业化的系列服务。通过政府间合作,有计划地组织本地劳动力到东部发达地区和对口支援省区打工学习,将劳务输出与外出学习培训结合起来,对于使用西部省区劳动力的企业、特别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企业,可以模仿福利企业,提供部分补贴或税收优惠,以资鼓励。也可以模仿东部省区学校办“西藏班”那样,办西藏厂西藏店、贵州厂贵州店等,以利用西部某地劳动力为主的厂和店,省区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补贴。通过多种方式,将劳务输出办成一个投资少、见效快,没有围墙、没有文凭、但有助于完成三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市场经济大学。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2.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各年。
3.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册)》,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
4. 严善平:《中国90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人口与经济》,1998年第3期。
5. 李树茁:《中国80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转移研究》,《人口与经济》,1994年第3期。
6. 王桂新:《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人口与经济》,1993年第2期。
7. 段成荣:《利用出生地资料进行人口迁移分析》,《人口学刊》,2000年第3期。
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回流与乡村经济发展》,《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0期。
9. 李永周、吴国良:《乡城人口流动与城市服务业发展》,《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0卷第4期。
10. 艾云航:《涌动着的“民工潮”》,《地理知识》,1994年第4期。
11. 杨晓勇:《民工流动与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3期。
12. 郭正模、孙成民、王实:《对当前四川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回归”现象的调查与思考》,《理论与改革》,1999年第1期。
13. 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4. 邱海盈:《农村劳动力回流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开发》,《人口学刊》,2001年第3期。
15. 蔡恩泽:《悄然回流的民工潮》,《乡镇经济》,1997年第1期。
16. 张善余、杨晓勇:《“民工潮”将带来“回乡创业潮”》,《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1期。
17.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5页。
18.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19. 崔功豪等:《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0. 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